

契诃夫的创作与 十九世纪末期现实主义问题

耶里扎罗娃著

杜殿坤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契訶夫的創作与 十九世紀末期现实主义問題

〔苏〕耶里扎罗娃著

杜 殿 坤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 9 6 2

Елизарова

Творчество чехова и вопросы реализма конца XIX века

本书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СССР 1958 年版本译出

契诃夫的創作与
十九世紀末期现实主义問題

原著者 [苏] 耶里扎罗娃

翻譯者 朴殿坤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8 3/8 字数：163,000

1962 年 6 月第 1 版

196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78·1992

定价：(九) 0.88 元

目 次

緒 言	1
-----	---

第一章	契訶夫的世界觀和美学綱領的形成。“瑣事”問題。不幸的人們的形象。 9
-----	--

第二章	契訶夫最初的中篇小說。“沮喪而忧郁的人們”的形象。个人主义与道德責任問題。 . . 84
-----	--

第三章	契訶夫九十年代的中篇小說里的“松勁的知識分子”和“套中人”的形象。对不干預社会生活的思想的譴責。 124
-----	--

第四章	契訶夫同頹廢派的斗爭。对利己主义的“方便哲学”和“唯我主义”的否定。 . . . 160
-----	--

第五章	契訶夫創作中的正面形象。真理探求者。“建立功勛、信心堅定、目标明确”的人們。 . 198
-----	--

結束語	258
-----	-----

緒 言

契訶夫生活和創作的年代——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最初幾年，是俄國社會史和文化史上最複雜、矛盾最尖銳的時期之一。

列寧寫道：“一八六二到一九〇四年這一時期，俄國正處於這樣的變革時代，這時舊的東西無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潰了，新的東西則剛剛開始安排，而且建立這種制度的社會力量，直到一九〇五年才第一次在遼闊的全國範圍內真正表現出來，在各種場合的群眾性的公開活動中真正表現出來。”^①

契訶夫是在八十年代初開始文學活動的，當時俄國正處在一八七九到一八八一年革命形勢減退之後，國內籠罩着“一種肆無忌憚、毫無理性和殘暴至極的反動”^②的氣氛。

垂死的貴族和農奴制關係的世界，和本身具有各種尖銳矛盾的、正在成長的資本主義，在俄國同時存在，形成一種極其錯綜複雜的局面。

列寧說過，農奴制度阻滯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俄國資產階級從來沒有充當過革命的社會力量。資產階級即使在爭奪統治權的時期也仍然是警察官僚制度的可靠支柱；它同

农奴制关系的残余欣然妥协，奴颜婢膝地为专制制度效劳。

但是，就在这时期，俄国社会内部诞生了新的力量，工人运动成长和发展起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革命活动。

在俄国，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和二十世纪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的准备时期。尽管有警察的专横暴戾和书报检查制度的残酷压迫，俄国文化艺术的高涨和繁荣仍然是这些年代的主要特征；这种高涨和繁荣，是由于俄国社会内部日益成熟的巨大的、创造性的革命力量所决定的。

这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中的俄国文化生活，是以许多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名字为代表的。契诃夫是托尔斯泰、谢德林、格·乌斯宾斯基、列宾、希什金、波洛丁、柴科夫斯基、斯塔索夫的同时代人，但比他们年幼；高尔基、柯罗连科、库普林、布宁、拉赫马尼诺夫、夏里亚平、瓦斯涅佐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等，是在契诃夫生前开始他们的创作道路的。

俄国，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八二年俄文版序言里所说，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所以它的文学能够提出和解决一系列不仅具有民族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和艺术上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在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各国的作家（莫泊桑、左拉、罗曼·罗兰、霍普特曼、高尔斯华绥）非常关切地注视着俄国，注视着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托尔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卷，第34—35页。——译注

② 同上，1955年版，第1卷，第263页。——译注

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从他们的创作中寻求自己所面临的复杂的哲学和美学问题的答案。

象当时许多其他的伟大作家一样，契诃夫没有参加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不了解它的历史意义，置身于这个斗争之外，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革命高潮的朝气蓬勃的影响。

从一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起，这位年轻作家就成了政治方面形形色色反动现象的毫不妥协的揭露者。

契诃夫的揭发达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他的短篇小说浸透着对庸俗习气、因循守旧、贪得无厌和寄生生活的毫不妥协的精神，具有强大的概括力量。

不仅如此，契诃夫的创作还远远超出了讽刺文学的领域。对即将到来的解放的预感，赋予契诃夫的优秀作品以浓厚的乐观主义和肯定生活的气氛。契诃夫已经约略看到摆脱停滞不前的现实生活的出路，虽然作家自己还不能明确地肯定这条出路。

高尔基写道：“契诃夫的每一篇新小说，都在日益加强一种对我们极其宝贵和需要的情调——生气蓬勃和热爱生活的情调。”

乐观主义的激情、相信人的创造能力、相信人们自己能够使生活变得更美好，是契诃夫创作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一切决定了他的创作对同时代的西方现实主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和八十到九十年代的西方文学相比，契诃夫的优秀作品中那种高昂的“生气蓬勃和热爱生活的情调”，就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

理想人物的问题是西方所有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左拉、萧伯纳、法朗士、罗曼·罗兰等等）都面临的问题，他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付出过惨痛的迷误和痛苦的摸索的代价，跟西方广泛流行的颓废主义、悲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进行过斗争。

契诃夫的创作，对于把“我”同周围整个世界对立起来的颓废派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强有力的驳斥。

在契诃夫生前，特别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他的作品已经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共鸣；各个国家、各种民族的作家和读者的许许多多反应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

九十年代初，契诃夫在写给符·阿·季洪诺夫^①的一封信里，应他的请求谈到自己的简历时，诙谐地说：“除了外国文^②，我的作品已经译成各种文字。象德国人早已翻译了我的作品。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也肯赏光。连法国人也少不了礼尚往来。”

一八九三到一八九四年间，法国波尔多大学教授居理·列格拉去梅里霍沃^③访问契诃夫，商谈把他的短篇小说重新

① 符拉季米尔·阿历克塞耶维奇·季洪诺夫（1857—1914年），俄罗斯小说家，剧作家。——译注

② 这是一种诙谐的说法，因为“外国文”是除了祖国文字以外，对世界各国文字的统称；就“外国文”这个词本身来说，并无具体的文字。——译注

③ 契诃夫于一八九二年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塞尔普霍夫斯克县买了一个小庄园，叫梅里霍沃，从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八年居住在这里。——译注

译成法文。

契诃夫在世时，英国、美国、希腊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中国和日本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有了契诃夫的小说和剧作的译文。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特别是四十和五十年代，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的声誉空前增长。除了他作品的译文以外，还出现了许多关于契诃夫的评论文章和专著。

契诃夫的创作从各个方面吸引着国外的读者和批评家。人们把契诃夫看作短篇小说的大师来研究他的创作。美国批评家弗朗西斯·纽曼很好地说明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成就，他在《短篇小说的发展》（一九二六年）一书里指出，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达到了“绝顶完美的地步”。同时，契诃夫又是创造了全新的戏剧作品的剧作家，从戏剧方面引起许多外国研究家和戏剧家的重视。

结合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情况来研究契诃夫的创作的著述也很多。最后，还有一些系统整理契诃夫的作品和关于他的著述的书评性的书籍。

一九五四年七月的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是一件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

各国的杂志和报纸都出版专刊来纪念这个日子。

俄国学者特别是苏联学者对契诃夫的研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其中许多作品，例如叶尔米洛夫的著作，在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时已经译成好几种外国文字。

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五年间，世界性的“契诃夫学”的领域

里，又新增加了许多重要的专著。

外国作家(以及普通读者)发表了许多言论，试图概括和总结出契诃夫创作中最主要的东西，说明契诃夫何以能够成为各民族的作家和各种创作个性的导师和典范；所有这些言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各国的作家都指出了契诃夫对他们的祖国文学的巨大影响。例如，郭沫若在一九四四年写道：

“在中国，虽然一向不十分为人所注意，他对于中国新文艺所给予的影响确是特别的大。

“他的作品和作风很合乎东方人的口胃。他虽然不做诗，但他确实是一位诗人。他的小说是诗，他的戏曲也是诗。”^①

留迪米尔·斯托扬诺夫^②在一九五四年写道：“我国人民象爱自己祖国的作家一样热爱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契诃夫对保加利亚的许多作家给予了富有成效的影响。……契诃夫是真正的人民作家。……”

约翰·高尔斯华绥早在一九二八年就说过：“近二十年来，对许多国家的青年作家来说，契诃夫是最有吸引力的作家。”

更早以前——在二十世纪初，当《万尼亚舅舅》在布拉格舞台上演出时，《人民报》(布拉格)的一位批评家写道：“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位不惧怕平常事物的诗人，一位魔术师，他能把日常生活的矿石变成宝贵的金子。”

① 郭沫若：《沸羹集》，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200页。——译注

② 留迪米尔·斯托扬诺夫(1888年生)，杰出的保加利亚作家。——译注

约翰·普里斯特利在一九四四年写道：“契诃夫的影响在今天已经十分巨大。契诃夫的艺术方法也是小说艺术的优秀匠师们在不久的将来要学会的一种方法。这是文学里最优秀的东西。”

艾里札·特里奥列在关于契诃夫的书里，把契诃夫归入他所说的那些永垂不朽的、使我们陶醉的、召唤人们跟着他们前进的作家的行列。

伊札贝拉·布留姆(比利时)在一九五四年写道：

“伟大的俄罗斯古典作家契诃夫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作家。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早已译成世界上的许多文字，而且因为契诃夫创造了普通人的卓越形象，这些人是到处都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

法国作家维尔科尔在一九五四年纪念日发表的文章里写道：“恐怕没有一个法国小说家，能够断定他不曾受到过(直接或者间接地)契诃夫的影响。

“甚至在那些……只读过他的一部分著作的人(比如我自己)中间，我估计也很难找到一个作家，是不曾在任何一点上得益于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的。……

“……我深信，在所有现代小说家的脉管里，都至少流动着契诃夫的几滴精神的血液。……

“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怀着深深钦佩的心情，象对自己的父亲一样敬爱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缘故。”

法国作家安德烈·伍尔穆塞尔在他的关于契诃夫的文章里完全公正地说：

“我们应当感激这位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因为他以自己的全部天才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

墨西哥作家何塞·曼西西多尔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说契诃夫是一位给全人类馈赠了“那么多令人惊叹的作品，以致它直到现在还欠着他的盛情”的艺术家。

这就是外国作家和批评家们对契诃夫的创作所作的一些含意深远的评语，这里列举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详尽地研究契诃夫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外国文学及其个别代表人物的影响；作者为自己提出了一个比较微小的任务，即从契诃夫的世界观、创作和美学中，提出几个对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现实主义和西欧现实主义来说具有共同性的主要问题，加以阐述，并且说明契诃夫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所作的新的贡献。

作者认为，就阐明“契诃夫的创作和十九世纪末期的现实主义问题”这一复杂而多方面的题目来说，此书只是一点初步的尝试而已。

第一章 契訶夫的世界觀和美学綱領的形成。“瑣事”問題。不幸的人們的形象。

契訶夫的創作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博得全世界的聲譽。在這以前，作家已經走過了將近十年的創作道路。契訶夫發展過程中的這個早期，內容豐富多采，照他的基本思想和形象逐漸成熟的情形來看，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因為這些基本思想和形象，在後來成熟了的契訶夫的作品中都成為主要的和基本的思想和形象。

契訶夫的書信是我們探討這位作家的觀點形成過程的一項極其豐富的材料（這些材料還遠沒有加以徹底研究）。從這些書信中可以看出，在很早的時候，即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契訶夫熱心探求的那些主要問題已經有了一定的範圍。一個十九、二十歲的青年的見解有時還不免幼稚，然而已經足以證明他的探求的深度和堅定的目的性。

在契訶夫早期的書信中，關於人的尊嚴、個人對社會應盡的公民義務和道德責任的問題已經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一八七九年四月寫給弟弟米哈依爾的信里，契訶夫寫道：“……為什麼你把自己稱做‘一個微不足道、默默無聞的後生’呢？在人群當中，必須意識到自己的尊嚴。你總不是個騙

子手，而是个正直的人吧？那你就尊重你这个正直的人吧，要知道正直的人并不是微不足道的。”^①

在一八八六年三月写给尼古拉·巴甫洛维奇^②的几封信里，包含着一种重要的思想，这在后来契诃夫同当代文学中的伪英雄——“沮丧而忧郁的”知识分子作斗争时，成为几乎是主要的思想。尼古拉在来信里抱怨人家“不理解”他，契诃夫看出这种虚假的情调，立即予以坚决的驳斥。

“你常常向我诉苦，说人家不理解你！！连歌德和牛顿也没发过这种牢骚。……人家对你理解得非常清楚。……如果你自己不理解自己，那就不是别人的过错。”^③

在这封信里，契诃夫对于“有教养的人”的特征作了很有意义的描述。

“他们尊重人格。……他们心地纯洁，象怕火一样害怕虚伪。就是在小事上他们也从不做假。虚伪是对听话对方的侮辱，使对方瞧不起说话的人。……

“他们不无谓奔忙。结识名流之类的虚荣不会使 他们 动心。……要是他们有才能，自然会受到人们敬重。为要获得才能，他们宁愿牺牲安逸、女人、美酒、虚名……。他们引以自豪的是自己的才能。

“他们在自己身上培养高尚的情操。……

① 《安·巴·契诃夫作品与书信二十卷集》，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44～1951年版，第13卷，第29页。以后简称《全集》。——原注

②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安东·契诃夫的哥哥。——译注

③ 《全集》，第13卷，第195页。——原注

“有教养的人就是这样。……要想成为有教养的、不同凡响的人，只读过匹克威克和背得出浮士德的独白还不够。……这就需要夜以继日的劳动，手不释卷的攻读，钻研，意志……。每一小时都是宝贵的。”^①

契诃夫在给他的弟兄提出这一类忠告的时候，并没有对哲学问题作抽象的议论。反对自己家庭中的庸俗习气是他的用意所在。但是他的言论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纯粹日常生活和家庭关系的界限。在这些尚未完全定型的言论中，已经非常明显地透露出作家后来的主要思想的萌芽。在契诃夫后来所写的反对文化上的市侩习气、反对侮辱人的尊严、反对对社会生活问题漠不关心的成熟的作品中，这些思想曾经发挥了那么强大的威力。

早在那些年代，契诃夫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自己的前途。在下面这封信里也可以使人明显地觉察到他对前途的感觉：

“我一面写，”契诃夫对格利果罗维奇^②说，“一面极力不把我所珍爱的形象和画面用在小说里，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爱惜它们，把它们珍藏起来。”^③

契诃夫劝告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④不要发表写得不好的作品，而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全彼得堡都在注

① 《全集》，第13卷，第196、197、198页。着重点系作者所加。——原注

② 德米特里·瓦西列维奇·格利果罗维奇（1822—1899年），俄罗斯作家。
——译注

③ 《契诃夫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页。——译注

④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安东·契诃夫的哥哥，记者，作家。
——译注

意契訶夫兄弟的工作。”^①

从契訶夫给他哥哥提出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早在一八八三至一八八五年间，对契訶夫来说，已经从高度原则性的立场上解决了作家和文学的任务问题，而这种立场绝不容许因为读者的审美要求或文化水平不高就打折扣。

契訶夫的这一切思想和见解，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早期创作的总的思想和情调，都是极其重要的。

契訶夫在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七年所写的作品，内容极其丰富多采，质量也各有高低；但是这些作品已经能够充分表明这位现实主义作家所走的道路，表明他是怎样在艰苦的奋斗中一步步地迈上广阔的文学大道的。

引人发笑的场面和对话，才气横溢地从周围现实中摄取来的“瞬息即逝的镜头”，虽然看起来好象很“琐碎”和互不连贯，然而里面却充满了作家的高度的公民热情，表明他对当时的俄国生活已经在形成一种十分明确的批判观点。正是在这一点上，甚至契訶夫用各种笔名所写的最初的作品，也与他发表作品的那些杂志上的文学作品是迥然不同的。

《蜻蜓》、《波浪》、《闹钟》、《娱乐》这类杂志的“社会上的定户”是些小市民读者，他们喜爱消遣性的文学，因此对于这类刊物投其所好地奉献给他们的那些低劣作品已经心满意足。

这类刊物的目的是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关心社会问题。它们所选择的题材范围纯粹局限于家庭和日常生

① 《全集》，第13卷，第157页。——原注

活问题的小圈子。爱吵架的丈母娘啦，内地的争先恐后地抢夺未婚夫的千金小姐啦，一毛不拔或者挥金如土的妻子啦，冥顽不灵的丈夫啦，寻欢作乐的官太太啦，等等，——这就是《蜻蜓》或者《娱乐》上的幽默作品的“主人公”。

我们可以毫不夸大这位初学写作者的有意识的成份，有充分权利说，上述契诃夫的早期书信中明显地流露出来的公民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的思想，是他的创作的基本情调。

“我不愿意，也不应当写胡说八道的东西，”契诃夫在一八八三年写给列依金^①的信里说。这并不是一句随随便便的话，它里面包含着完整的创作纲领的种子。所谓不写胡说八道的东西，就意味着要写人民的不幸和苦难，写俄国现实生活的症结，写一个公民兼作家无权回避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东西。

我们正应当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契诃夫的早期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天才创造了“俄罗斯这个官僚国家”的代表人物的不朽形象，如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官府的“小人物”以及形形色色具有变态心理的人物。

亚历山大三世在一八八一年即位后，履行了他的诺言：竭尽全力维护专制政权，使它“免遭任何暗害”。因此，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在这个沙皇身上看到了“道道地地的”专制制度，对他的十三年统治作出那么“高度的”估价，并不是偶然的。

①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列依金（1841—1906年），俄罗斯幽默作家，《花絮》杂志的主编。——译注